

黄科安 著

延安文学研究

—— 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

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五四”理论旅行的结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者建构一套旨在改造国民的灵魂、扫除封建积弊的启蒙主义西方话语系统，那么经过整风后的延安文人遵循着毛泽东指示，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承担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的任务。延安文人在“借用”民间形式到“改造”民间形式到“再造”民间形式的过程中，戏剧（戏曲）成为延安文艺中极富生气、极为活跃的文艺门类之一。小说，在延安文学的各门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它成为延安文人“想象”边区的新天地、新农民、新主题的重要表现方式。这些文学工作都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是延安文人承担起了这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黄科安 著

延安文学研究

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文学研究/黄科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39-3675-3

I. 延… II. 黄…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5528号

延安文学研究

——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著 者 黄科安

责任编辑 陶 玮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宝 华

封面题字 润 农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8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675-3/I·1656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绪 论 延安文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 话语体系	(1)
第一章 文艺方针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11)
一 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12)
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建构中国共产党文艺界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规范	(16)
第二章 延安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意义构成	(25)
一 延安文人与“五四”启蒙话语 ——关于前期延安文学(1937—1942年)的考察	(26)
二 文艺整风对延安文学的改造与拓展 ——关于后期延安文学(1942—1949年)的考察	(38)
第三章 文本、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诉求	(59)
一 秧歌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60)
二 周扬与《白毛女》政治主题的提炼与彰显	(68)
三 鲁艺文人对“民间形式”的想象与改造	(76)
第四章 转型的启示:丁玲创作中的性别与政治	(85)
一 起点:从“性别”到“政治”	(88)
二 深化:批判立场与潜在女性话语	(97)
三 改造:主流意识形态的凸显	(109)

第五章 周立波:革命想象与意识形态的修辞策略	(119)
一 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	(121)
二 《暴风骤雨》:新写作方式的示范与意义	(131)
第六章 赵树理: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与瞩望	(147)
一 “赵树理方向”的构建与反思	(149)
二 民间的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	(157)
三 大众化叙事策略与可说性的文本	(165)
第七章 孙犁:在主流文学中的边缘性言说	(173)
一 女性、战争与美的极致	(176)
二 农民、土地与家园意识	(190)
三 知识者的文化立场:从“颂歌”到“孤愤”	(203)
附录	(217)
一 艾青:传统的叛逆者与精神乌托邦诗人	(218)
二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 意义与缺失	(261)
三 走向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深处 ——评袁盛勇的《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 复杂化形成》	(278)
参考文献	(285)
后记	(290)

绪
论延安文人：
构建现代民
族国家的本土
话语体系

本书以延安文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的角色与贡献。延安文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精英，其创作与实践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与民众的诉求。通过分析其文学、艺术及社会活动，本书旨在揭示延安文人如何运用本土话语，构建起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体系。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文化层面的革新，更触及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本书认为，延安文人的努力，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仍具有深远意义。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延安文学》、《延安文艺》、《延安日报》等大量原始文献，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等权威著作。同时，还广泛收集了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专著及档案资料。本书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对于延安文学，我们过去在学理研究方面较为匮乏，这几年开始引起一些学人的注意，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人们通常认为延安文学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产物。周扬说：“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创作活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政策的开始结合。”^①正因为如此，学界对延安文学的价值判断上一直处于偏低现象。然而，事实上，延安文学，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明了，它需要人们转换新的思维观念，挖掘新的内涵，得出新的价值和意义。

延安文学以1942年的文艺整风为分水岭，前后文学所反映的内容与体现的形式大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政策，赢得了民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间成为国统区文人和知识青年向往的“圣地”，他们纷纷前来投奔。有人曾就延安文人的构成成份作过分析，发现：“延安文人是个较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奔向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大致可归纳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②这些由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构成的延安文人，在这个充满梦想的“天国”里，享受着中国共产党战时实施的供给制所给予的物质和生活的保障，且他们可以率性而行、自由结社，自由创作。不过，他们在延安度过最初的“蜜月”期后，仍习惯于操持“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话语，用“体制”外的眼光发掘和批判延安肌体上残

^① 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序言》，《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

^②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留的旧时代病菌和新滋生的病毒。1940—1942 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以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推动的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新潮。对于这些作家而言，现实批判不惟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和天职，揭露丑恶、祛除黑暗正是他们对延安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爱护的体现。而文艺整风后，延安文人从人身到精神都被结合进“体制”内，成为建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延安文学也就成为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

毋庸置疑，解读延安文学回避不了毛泽东发动的党内整风运动的思想内容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简称《讲话》）的精神实质。毛泽东为了肃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存在着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洋教条”思想的统治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尽快“中国化”，完成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建构，因此首先在上层领导圈内展开思想整风运动，并随后扩及全党。而文艺界的思想整风，其实是党内整风必然延伸的组成部分。在战时的延安，一切的工作重心，都必须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学也不例外。毛泽东在《讲话》里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毛泽东关于“两支军队”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延安文人承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的重责。这样，文学就成为当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是建构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技术手段。那么，如何让文学服务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呢？毛泽东借助“政治之力”，规范和引导了文学的想象方式和想象的内容。他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49页。

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因此，当延安文人被规范为“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时，他们在创作中突出文学的政治性，事实上就已经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达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延安文人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政权普及新的政治、文化纲领，同时也依靠这一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制约新的文化生产。

显然，这种文学新的想象方式和想象内容与“五四”知识者接受西方现代性话语迥然有别。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五四”理论旅行的结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者建构一套旨在改造国民的灵魂，扫除封建积弊的启蒙主义西方话语系统，那么经过整风后的延安文人遵循着毛泽东指示，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承担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这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人们对此应该实事求是、审慎评判。

然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拿“五四”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衡量延安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粗暴简单的推论和误判。有的学人指出：“1942年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思想改造的规范理论正式确立，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工农大众两大群体，终于开始了根本性的位置转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延安文人的社会地位、人格精神和文艺观念并未提供更多的现代质素，相反，他们的身上却鲜明显现出某些陈腐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印记，他们回到了‘五四’的起点。历史的重演常常会引导人们回溯历史，寻找具有反思价值的关键环节。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延安文人那里丧失殆尽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人格，在‘五四’知识分子那里获得时就缺乏应有的强度和韧性，否则就难以解释它们何以如此短命。”^② 之所以得出“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的结论，这是论者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62页。

② 许志英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92页。

心目中以“五四”作为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而导致的。然而，“五四”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能否作为惟一的选项并挪用来评判延安时期的文学？显然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近年来，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出现，它作为反省现代性的理论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的眼光。在后殖民的理论视野里，“五四”新文化运动走的是一条全盘否定传统、崇尚西方的路子，新文化先驱者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的本土上做一个横向移植，从而构建了民主、科学、人性解放等现代理性内容的价值标准。尽管我们难于苟同中国后殖民批评家将“五四”的现代性追求，笼统批评为带有浓厚的殖民话语色彩，并把这一现象的产生直接归咎于陷入西方殖民主义圈套。但是，这一理论视角，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五四”时期形成的文学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当作金科玉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说延安文人质疑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那么本时期的延安文学在毛泽东的《讲话》的理论设计下，凸显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和本土意识。从表面上看，这时期延安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走向“民间”，好像是回归“传统”，但这正是建构具有本民族内涵的现代性起点。其实，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之一。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从而梳理和重构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大众神话与传统文化。因此，“在‘民族国家’或‘阶级’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制造过程中，传统的认同方式如种族、宗教、伦理、语言等都是重要的资源。当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被解释为有着久远历史和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的共同体时，它的合法性才不可动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政治才被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心性结构和情感结构”^①。那么，如何在军队和老百姓中心里植入新的政治认同理念呢？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普

①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容易在广大群众中迅速流传和迅速接受；同时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样的文艺才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因此，为了贯彻《讲话》的精神，延安文人就要走向“民间”，进而开辟出一片新的艺术天地。当时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民间文艺资源相当丰富。民歌、地方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文学，品类繁多，异彩纷呈，有秦腔、信天游、道情、秧歌、花鼓等等。这些质朴、清新、刚健的民间文艺样式，一时间成为延安文人进行“文化革命”改造的重要艺术资源。

人们发现，延安文人在“借用”民间形式到“改造”民间形式到“再造”民间形式的过程中，戏剧（戏曲）成为延安文艺中极富有生气、极为活跃的文艺门类之一。文艺整风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认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与部队中普遍发展。”^②可见，戏剧（戏曲）承担了毛泽东《讲话》后建构中国共产党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也是实现在军队和老百姓中植入新的政治认同理念的代表性文艺门类。那么，为什么戏剧（戏曲）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延安文人首选的重点发展的文艺门类呢？戏曲在古代中国曾是较为发达和兴盛的一门文艺种类，在现代中国的广大农村更是有广阔的天地和市场，为老百姓所喜欢。除此之外，自古以来中国戏曲还具有独特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63页。

^② 《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8日，转引自《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金紫光等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

它与民间祭祀和民间节日活动密切相关，具有民众的群体集结、参与和狂欢的特点。因此，“一个建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共同的价值观形态、共同的情绪、共同的焦虑与向往为目标的时代，往往是戏剧繁荣的时代。每当意识形态感到群体本质认同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因而要重温或再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时，戏剧便具备了繁荣的客观条件。”^①

秧歌，本是北方农村里的一种民间艺术。文艺整风后的1943年春节，经过延安文人改造后的新秧歌，在延安的南门外广场“闹”起来。当时有近百支宣传队、秧歌队在广场上亮相，场面颇为壮观。为此，《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称赞此次春节文艺活动是以“新面目”，“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收到了很大的教育的效果”。^②作为参与建构延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艺界领导者周扬，更是从1944年春节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秧歌活动中，解读出秧歌所起到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群众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像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广大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③的确，在“闹”秧歌中，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普通干部、士兵、老乡乃至文人，都无一例外被这“狂欢”仪式所卷进，从而达到高度的政治认同，这就为未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打下了比政治基础更为深层的文化基础。

而从小型秧歌《兄妹开荒》的出现，再到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的编造，延安文人在民间秧歌的利用和改造方面，开始一步步地迈向艺术的成熟之路，其结果是直接催产出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从而发挥了更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效应。“白毛仙姑”这个新民间传奇的文本，其实是存在着多种可能的创作方向，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有人说可以写出

①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②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社论），《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

③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一篇“破除迷信”题材的文章，甚至后来的研究者还发现这个故事还可以写成一篇“诱奸故事程式”的作品。但是周扬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和从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敏锐地从这个新民间传奇中发掘出具有重大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主题，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因此，他在组建鲁艺创作班子时，要求抓住民间传奇文本中的积极意义，把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这就将有着多重语义发展可能性的民间传奇文本纳入了“阶级压迫和反抗压迫”的叙事框架中。新歌剧排演完，作为中国共产党“七大”的献礼，首次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公演，获得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和“七大”代表的充分肯定和表扬。在解放战争年代，歌剧《白毛女》随着部队走向各个解放区。这部“适合时宜”的新歌剧，确实在参与延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起到巨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效果。

小说，在延安文学的各门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它成为延安文人“想象”边区的新天地、新农民、新主题的重要表现方式。赵树理是“问题小说”的提倡者，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① 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取材于山西辽县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悲剧故事。但赵树理并没有将小说写成悲剧，而是给小二黑、小芹一个“大团圆”的喜剧。这是因为赵树理要配合边区政府公布《婚姻暂行条例》和《妨碍婚姻治罪法》的宣传和显示边区政府革除旧的婚姻制度、提倡自由恋爱的决心和力量。彭德怀曾亲自为这篇小说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说明了赵树理自觉地将党的政策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做法，符合当时延安政权构建的“民族国家”叙事的方向。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两部反映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曾被文学史家誉为延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充分体现

^① 赵树理：《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6月26日。

党的政策是怎样与艺术构思相“媾和”。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最大的特色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供了“农村变革中的农民”和“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农民形象”。这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是延安文人承担起这一时代赋予的使命。那么，延安作家是如何设计和规范他们心目中的“农村变革中的农民”？这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从天翻地覆的农村变革的广阔背景下来描写农民，刻画农民的成长历程或性格变化，使人物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性；一是从政治的革命的视角出发，规范农民的阶级定性和政治内涵，使人物的塑造趋于概念化和公式化。正是这种双重视角，延安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农村变革中的农民”形象，有了自己独特的、无可替代的“规范”理念。孙犁在反映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妇女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时，他更多采用日常生活的伦理视角，着眼于女性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体验和表现，写出广大农村妇女的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而现代政治的“想象共同体”通过作家的日常伦理叙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心性结构和情感结构，从而更容易激发广大的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热情和信心。

我以为，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毋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揭示延安文人如何承担既定的意识形态而对刚刚开始（或过去）的历史事件做“经典化”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回到历史的深处，揭开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并寻找和把握延安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可化约的复杂心态。丁玲经过文艺整风这场脱胎换骨似的“洗澡”，她曾发出“回头是岸”的反省：“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我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① 丁玲有这番“回头是岸”的反省，才有她后来改弦更张地创作出被誉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是丁玲创作最为艰难、耗费最大心血的作品。如果

①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

我们关注它的产生过程和揭示它的意义结构，也许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经典文本。对于一个刚经历文艺整风而受到领袖力保的人，丁玲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情形下，丁玲对于《讲话》的指示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执行。但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丁玲常常陷入“政策”变化与“形象”塑造之间的矛盾纠缠之中，她深有感慨地说：“这一次的土地改革却比现实中的土地改革更困难，因为我比那时候要清醒些，我走入到人们的心里面也比较深些，我更不能犯错误，我反复去，反复来，又读了些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我对我的人物选择更严格些。”^①丁玲的睿智卓见和患得患失的复杂心态，很值得后人从中细细玩味和追究。

有学者称：“延安文艺，亦即充分实现了的‘大众文艺’，实际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含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久远的乌托邦冲动。”^②这也就意味着，延安文学让人感兴趣的除了能够透过历史文本窥视延安文人内心的复杂世界，而且更让人看重他们当时是如何承担着民族主体与“他者”的想象之关系。诚然，在文学叙事者的眼里，历史从来就是多元的，叙事者的历史描述总是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是”来简单抹杀昨日的“非”，以符合今天主流话语的标准去否定过去延安文人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建构。学术界一旦从追究传统本质主义转向关注历史文本的话语分析，也许才是真正打开通往研究延安文学的大门。

① 丁玲：《一点经验》，《文艺学习》1955年第2期。

② 唐小兵：《大众文艺与通俗文学：〈再解读〉导言》，《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第一章

文艺方针与构建现代 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一 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背景

1942年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解放区文艺思想具有历史性的转折对解放区 and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新时期，其影响的余绪还时隐时现”^①。因为这一年的5月份，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后来题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简称《讲话》）的著名演讲。那么，《讲话》的产生和出现有何特定的历史语境？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是如何？它与延安的整个思想整风运动又是怎样的关系？

在20世纪20、30年代，曾被讥讽为“狭隘经验论”的毛泽东屡次在危机的关头，力挽狂澜，扭转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不利局势，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如在整风运动中，朱德曾这样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②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和军队中形成了权威性的领导地位。但同时，随着1937年王明等人的回国，这些人虽对中国革命实际一无所知，但他们靠着喝过洋墨水、有着共产国际背景，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毛泽东深知，中国共产党虽然从长征屡战屡败的痛苦中，凭着经验教训，本能排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实际上的总书记博

^① 贾冀川：《1942年解放区的文艺思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